

（二〇一八年七月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铁窗生涯】	狱中杂记（上）	马云龙
【往事非烟】	文革初期思想巨变记	吴根耀
【亲历者言】	毛泽东在林彪出走的那些日子里	陈长江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铁窗生涯】

狱中杂记（上）

• 马云龙 •

◇ 恐怖的等待（见本刊 z k 1 7 0 3 a）

◇ 钉子户之祖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看守所的铁窗下认识一个人，可称是“钉子户之祖”。

1975年1月，我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先是关押在河南省长葛县看守所，后又
被转押到许昌县看守所。直到1979年初才被释放、平反。

关进许昌县看守所的第一天，有一个犯人就吸引了我的注意：

“放风”（在看守所里，所谓“放风”，是每天两次准许各监号的犯人依次上厕所）
时，从隔壁的监号里走出一个矮小的老头。秃头，面色青灰，胡须蓬乱，看得出已经很久没
见过阳光了。他佝偻着身躯，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裤子上破了个大洞，露出半个屁股和皮
包骨的大腿。脚上拖着一双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破鞋。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赤裸的双臂像软
面条一样垂在前面，一走两甩，悠来荡去，显然没有任何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

同号的犯人告诉我，这是看守所里“资格”最老的未决犯，从1966年就关进来，到
我进来时已关了九年，但一直没有判决。他的胳膊被绳子捆断了神经，瘫痪多年了。

“罪名是什么？”我问道。

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扇了毛主席三个耳光！”

这个不平常的罪名使我对他有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从曾经与他共同关过一个监号的老犯人那里，我陆续得知了他的大概情况（很奇怪，在隔离、管束那样严格的监号里，有些人的消息竟然那样灵通，一些老犯人对每个犯人——包括新进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他叫寇学书，是许昌县寇店乡（当时叫寇店公社）寇店村的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土改前，他家没有一寸土地，土改中分得三亩半土地。这时的寇学书成了共产党的铁杆拥护者，由政府颁发的、盖着红红大印的“土地证”，成了他的无价之宝。依照当时的法律，他不仅拥有了三亩半土地的使用权，还拥有了这片土地永久的所有权，他的子孙还有了对这土地的继承权，这对世代代视土地如命根子的农民来说，具有何等的意义啊！

寇学书爱这“土地证”爱到痴迷的程度：放在家里吧，怕万一失火烧了；藏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吧，还怕万一被人偷走了。于是，从领取了“土地证”的那天起，他就把它揣在怀里，放在最贴心的地方，下地干活时都不离开，连晚上睡觉也要不时地摸摸。这在村中成了尽人皆知的笑料。

寇学书和土地的“蜜月”很快就随着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而结束了。

1953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上级号召个体农民要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让几家农民把自家的土地拿出来，共同耕种。当然，当时还说这是“自愿的”。寇学书表态了：“自愿？我自愿不参加互助组！”

紧接着，“互助组”成了“初级社”，“初级社”又变成了“高级社”。到1955年，毛泽东所欢呼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来到了，虽然“自愿参加”的规定并没有废除，但在政治运动的强大压力下，谁敢对抗这“历史潮流”？于是，亿万农民不管心里愿意还是不愿意，绝大多数都不得不“自愿”地放弃了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拱手交出了自己珍爱的土地。到了“大跃进”的1958年，毛泽东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农村几乎在一夜之间都实现了“公社化”，农村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制度，被土地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所取代了。而这个巨大的变化，离“分田分地真忙”的“土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可以说，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还没有捂热，就被变相地收走了。

在这场“摧枯拉朽”的“社会主义改造”风暴中，寇学书这位挚爱土地的老农居然一直顶风到底，拒绝把他的三亩半地交给“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他的三亩半私有土地成了“红海洋”中一个奇迹般的蓝色存在，而他独立于“集体”之外的“单干户”身份则早已是中国农村中罕见的特例。这还真得要感谢他头顶上那个“贫农”成分“红帽子”，他“自愿”地坚决不入社，让人想整他也无从下手。因为从理论和政策上来说，“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而“合作化”的前提还是农民的“自愿”啊。

直到1964年“四清”运动中，整他的理由终于有了：他这是“顽固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四清”的对象。在许昌县几十万亩公社土地的包围中，只有他这三亩半土地是私有的，格外显眼刺目。“四清”工作队给他起了个形象的外号——“小台湾”。于是大会批，小会斗，大字报满墙，大喇叭广播，把他整得不亦乐乎，寇学书成了远近知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倔强的老农居然心如铁石，不为所动，死也不肯把贴身藏在心口的“土地证”交出来。

工作队气急败坏，最后抛出了杀手锏：“好，我们承认那三亩半地是你的，但是，从你家门口到那块地之间的路，可是属于人民公社的呀。我宣布，从此禁止你走公社的路！”工

作队一声令下，公社民兵就手提木棍，天天站在他家门口，只要见他伸脚踏上“公社的路”，就挥棍打他的腿。

这一招可把寇学书制苦了——有地却无法插翅飞过去种，只能任其荒芜；而整天不出门，躲在家中，吃什么呀？这下子该乖乖地交出“土地证”了吧？

然而，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寇学书从村子里逃走了——怀里还揣着那张他视为神圣的“土地证”，他依然没有屈服。

谁都能想象，在那全国城乡都已高度组织化、网格化，居住要户口，出门要介绍信，来客要登记，买粮要粮本，吃饭要粮票的年月，一个手无分文的农民，逃离自己的家乡，到外面去混，是何等的艰难。

然而，中国农民的生存能力是令人吃惊的。寇学书来到了离家最近的小城市许昌，在城边的荒地上搭了个小窝棚住下来，每天拉着辆破架子车进城去打扫公厕。那时中原县城级的小城市还很少有冲水公厕，大都是十分原始落后、卫生条件极差的“旱厕”，全靠人工来清理打扫，而小城的环卫部门当时要么还没有建立，要么是形同虚设。这就为寇学书的生存提供了一个不大的空隙。他在城里打扫公厕，又把清理出的粪便拉到城外，找块空地铺开晒干，就成了上好的天然肥料，而肥料又是当时农村紧缺的物资。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为了学大寨、创高产，急需肥料。可买化肥要按计划分配，想要多买点，要走后门、托关系，十分艰难；而优质的天然肥料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寇学书的“产品”居然成了抢手货，不愁销路。

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玩笑：一年下来，公社体制之外的寇学书靠卖粪干取得的收入，竟然比在公社里干活的“社员”们还要高得多！我那时在离许昌不远的农村插队劳动，最棒的劳力一天挣十分，可每分只值一分多钱，也就是说，劳作一天只能挣到一毛多钱。可寇学书的“产品”，一架子车就能卖一块多钱，是社员中最强劳力的十多倍。

年底，要过春节了。在外辛劳了一年的寇学书要“荣归故里”，回家过年了。他特意买了半扇猪，挂在架子车把上，洋洋得意地回村了。他故意拉着车绕村一周，似乎是在向“公社”示威：“你们不叫我种自己的地，可我有办法比你们过得滋润！”——当时，生产队在过年前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三斤、二斤的就不错了，寇学书的半扇猪确实叫人看了眼绿，也使社员们心乱如麻。

这是1966年的开春，村里的工作队已经撤离了，当政的是大队党支部。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思想武装起来的支部书记从中看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然不能置之不管。于是他学着当年工作队的腔调，向寇学书宣告：“这猪肉是你的，但村里的井是人民公社的！你要煮肉做饭，不准从公社的井里打水！”

老办法：派民兵拿着棍子站在井边，见寇学书来打水，就给他一顿棍子！

寇学书傻眼了，又差点被气疯了……

寇学书当时无法知道，刚开始的1966年可不是个吉祥的年头。报纸上在批《海瑞罢官》，接着又批“三家村”、“四家店”，中国上空浓云密布，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临了。

村里开大会，形式也变了。会场中间立起个巨大的毛主席像，人人手举“红宝书”，先要喊“万寿无疆”，再念“最高指示”……可寇学书却悄悄地挤上台去，一直挤到毛主席像下面。当主持人宣布大批判开始时，这位老农民却突然站起来，跳着脚，举着巴掌向毛主席像脸上扇去，一连扇了三巴掌，每扇一巴掌，嘴里还喊一句：

“叫你不让我下地……”

“叫你不让我打水……”

“叫你收走我的地……”

据寇店的人说，当时，全场的人都惊呆了，好久没有动静。突然有人喊了声：“反革命！”人们才醒过神来，群呼：“打死反革命！打死反革命！”寇学书被蜂拥而上的人群打翻在地，打得血肉模糊。最后被用绳索紧紧地捆起来，送往县看守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叫“被革命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巴掌扇在纸上，这叫什么罪，新老刑法上似乎都没有规定。但是“文革”中规定的“公安六条”中，有一条是“攻击伟大领袖”，那可是弥天大罪，足以杀头的。寇学书就是据此被投入牢房的。

寇学书被投入牢房，却多年没有判决，一直在看守所里“待决”，这是为什么？我出狱后才从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那里听说，是因为没有档案。被群众扭送来，看守所就收了。但“文革”中先是“砸烂公检法”，接着又进驻“军管会”，后来主管的又换成了“革委会”，看守所的主管走马灯似的轮换，谁也没见到寇学书被捕的审批文件。有人抓，没人管，但也没人敢放。于是，寇学书就在牢房里“沉底”了，多年来连审问也没有，终于成了那里“资格最老”但无人过问的在押未决犯。

1976年夏天，我终于有段时间和这位老农民住在一个监号里了。本来，看守所里似乎有条规矩（这是我经过长期观察发现的）：政治犯只能单独关押，或者和形形色色的刑事犯关在一起，两个政治犯是不能关在同一个号里的，大概是为了防止他们思想交流和互相串联。但是，到这年夏天，不知道外面又搞什么运动了，进来的人突然增加，牢房里人满为患。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监房，原来最多关五、六个人，现在增加到十二、三个，晚上睡觉都无法翻身。政治犯不能同号的规矩已无法维持了。一次在“查号”之后进行了“调号”（这是犯人都熟悉的专用名词，“查号”大约每月一次，所有犯人都突然在机枪和刺刀下，被赶到院里蹲下，让看守进到监号中彻底搜查，气氛十分恐怖。而“调号”则是重新宣布进住各监号犯人的名单）。我和寇学书居然住到了一起。

就近观察这位老人，我发现他的精神似乎已经失常了。对别人的问话，他反应迟钝，目光空洞，很少回答。

我问他，胳膊是怎么残废的，他低头不语。

我问他，多大岁数了，他两眼茫然。

惟一能引起他注意的是开饭的哨声。他吃饭的样子惨不忍睹：由于双臂双手瘫痪，他不能端碗拿筷，就由别人把汤盛到碗里，放在墙角的地上，把馍放在碗边，他趴在地上，像猪一样用嘴去拱着吃。一日三餐，都是如此，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了这么多年的。至于大小便，那就更没法说了，全靠别人帮助……

他也有说话的时候，多半是自言自语，而且总和种庄稼有关。外面出太阳了，他会说：场上的麦子该扬场了……外面下雨了，他会说：这雨好啊，玉米该拔节了……只有一次，他

说出了令我吃惊的话——他眼中突然亮光一闪，毫无缘由地说：“我当皇上了，全国一个县给我上贡一粒米，就够煮一锅饭了……”

一个当时已经关了七年、名叫韩拴紧的老“投机倒把犯”告诉我，寇学书的胳膊是进看守所后，被“上绳”捆坏的。他说，那时寇学书很不老实，天天胡喊乱叫，说反动话。看守把他提到院里，给他来了个“五花大绑”——他还颇为内行地说，别小看“法绳”这刑具，“上绳”的学问可大了，绳子的粗细，捆的部位和劲道，以及“上绳”的时间，都大有讲究。最狠的就是“五花大绑”，用小拇指粗细的绳子，狠狠地捆进肉里，再从背后收紧，没有人能扛过15分钟。超过15分钟，两臂就变得黑青，神经就坏死了，解开后也无法恢复了。寇学书就是被捆成这样的。

他还告诉我，寇学书比他大8岁，进来的时候大约是62岁，现在住了10年，应该是72岁了。他还说，这些年来，没见有人来给寇学书送过衣服和日用品。

我和寇学书同住一号的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来月。

这年夏天的气候似乎格外闷热，一个监号里睡了十多个人，只有一扇小窗通风，人挨人，肉挤肉，热得大汗淋漓，室内汗气尿气熏人，让人几乎窒息。没有几个人能睡得着。昏昏沉沉中，我突然发现躺在身边的寇学书有点异样，脸色铁青，毫无生气。伸手一摸，已经没有呼吸，浑身冰凉。我连忙爬起来，向外面执勤的哨兵喊道：“死人了！寇学书死了！”哨兵叫来看守，看守隔着小窗看了看，说：“喊什么喊，死了就死了，放在那里吧。看守所有规定，夜里不准开监号门。等天亮再说吧！”说完就走了。

身边挨着一具死尸，这一夜是怎么熬到天明的，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寇学书那瘦骨嶙峋的躯体越来越僵硬，刻满皱纹的面孔似乎越来越狰狞，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尽量不去看他。

我是一个在城里长大，在学校里成人的所谓知识分子。尽管曾参加过“四清”，还到河南农村接受过几年“再教育”，但是，真正开始严肃地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是在铁窗下，在寇学书的尸体旁的这个不眠之夜。

好不容易，天终于亮了。看守来打开牢门，让我和几个犯人把寇学书的尸体抬到院里。那里停着一辆破旧的架子车，寇学书被扔在车上，由一个农村模样的人拉出看守所的大门了。我突发奇想：这架子车是不是寇学书拉大粪的那辆？来人是他的亲戚，还是他拉大粪的同伙？这位72岁的老贫农，在熬过十年的铁窗生涯后，终于获得自由了，真让我羡慕。而我还要在这里呆多少年呢？将来我将如何走出这个大门呢？或许也要像寇学书一样……

两年多以后，我竟然活着走出了这个铁门紧锁的大院，并且意外地获得了“平反”。不过，我始终没有听说有人为殁毙在这里的寇学书“平反”。

◇ 迷惘的“殉道者”

漫长的铁窗生涯中，有两条毒蛇日夜不停地缠绕着你——一条叫寂寞，它啮咬着你的心灵；一条叫饥饿，它折磨着你的肉身。

四年多的时间里，曾和我同住过一个监号的犯人先后有上百个，大都是萍水相逢，过后即忘，但有一个人在和这两条毒蛇的搏斗中都有令人吃惊的超常表现，让我终身难忘——不要误会，不是敬佩，而仅仅是惊讶。

他叫裴和阳，是许昌县椹涧公社的青年农民——准确点，应该说他是个“返乡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这是那时他所能获得的最高学历，因为当时所有大学都停止招生了。那种在大字报、大辩论、大批判、大串联中的造反经历，不也是一种特殊的学习和训练吗？他可以说是那场“大革命”的“科班毕业生”和直接产物。强调这一点很有必要，非如此，便不能理解和解释此后他的人生轨迹和悲剧下场。

裴和阳回村后，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学历，和他对“文革”话语的熟练掌握，受到村中掌权者的青睐。他没有去当个“普通劳动者”，而是当上了村广播站的编辑兼播音员。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这可是个美差，既不受风吹日晒，又风头十足，天天让自己的声音覆盖整个村庄，这是何等的荣耀和享受？大约相当于现在电视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务，是转播“两报一刊”的社论和当天的重要新闻。其余的时间，放放“样板戏”的唱片和“红歌”的录音，偶尔也会广播几条村里的通知或村干部的讲话，倒也不费他什么劲。最让他得意和热衷的是，他还可以自己动笔写点“大批判文章”，写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种发表啊。内容倒不发愁，“小报学大报，大报学梁效”，跟风学样就行，不会有多大差错。

“裴大眼”（这是他的外号）的幸福生活让村里好多年轻人艳羡不已。但是，好景不长……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监号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个头发蓬乱、脸色苍白、身材消瘦，但服装还算整洁的年轻人抱着被褥走了进来。引人注意的是他那双眼睛，大大的，稍微有点凸出，眼神充满了迷乱和困惑。他站在门口，半天一动不动，似乎搞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送他进来的看守对我说：“给他讲讲看守所的规矩。”说完就锁上门走了。

这就是裴和阳。

问他犯了什么罪，他半天不吭气，最后低声说了句：“他们说是流氓罪。”然后两颗大泪珠从脸上垂落。

“让人家抓住了，还是被别人检举了？”同号的几个犯人兴奋起来，连连追问。这些人对强奸、通奸、流氓之类的“黄案”特别感兴趣，进来个这样的犯人，非问个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阳的回答让人意外：“没人抓，也没人检举，是我自己交待的。”

经过几天的反复盘问，我才慢慢弄明白他进来的原因。

“文革”一开始，经常举行“斗私批修”会，像宗教的“告解”仪式一样，人人过关。这一套仪程，连裴和阳所在的农村也不能例外。

上级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斗私字一闪念”，公开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做到“亮私不怕丑，揭私不怕疼，斗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对领袖“献忠心”了的检验尺度。

但这一套说辞太高深了，农民们哪里听得懂？结果一连几个晚上，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发言，发言的也是东扯葫芦西扯瓢，说得不上纲也不上线。驻队干部到公社一汇报，村革委会主任就挨了批评。

主任找到裴和阳：“你是高中生，在外面见过大世面。这私怎么斗，修怎么批，你带个头，给大家做个样板，好吗？”许诺这个头带得好，可以考虑介绍他入党，并推荐他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去参加全县的“讲用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根本无法明白，这在当时是多大的荣誉，也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我认识一个当年曾在全省巡回作“讲用报告”的人，从此踏上仕途，后来青云直上，最后当上了省级高官。）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荣宠，如此的诱惑，怎能不让年轻的裴和阳血热心动？他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用了几天的时间，他精心地准备了个发言稿。讲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农村劳动；如何公私不分，把广播室的灯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农村青年不同……但看来看去，总不满意，觉得挖得不深，批得无力，无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时广为宣传的斗私批修典型——门合同志的一句话给了他启发：“别人知道的要挖，别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来！”也就是说，要把“灵魂深处”不为人知的、最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挖出来，才算是达到了“三忠于、四无限”的高度！

他最见不得人的、最肮脏的隐秘是什么呢？
——是想女人。

他当时刚刚20岁，正在青春萌动期。一见漂亮的女孩就脸红心跳，可有机会还是喜欢往女孩们身边凑，夜里还常常做些无法言说的梦……真是肮脏极了！这不是万恶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是什么？

于是，他站到讲台前，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把这些隐秘一一道来：

在打麦场上，借教某某女孩学骑自行车的机会，伸手摸过她的屁股……
在菜园小屋躲雨的时候，借帮某某女孩拧湿衣服的机会触过她的乳房……
在村边的池塘边上，曾偷窥过女孩们洗澡……
没人的时候，他偷吻过晾衣绳上的女人内衣……
夜里做梦时，曾梦见和某某拥抱在一起……

一桩桩，一件件，他以“脱裤断尾”的决心，沉痛地坦白了这些当时没人知道，但又绝不可原谅的丑行和思想，痛骂自己猪狗不如，还深挖思想根源，说这都是放松思想改造，偷偷地看了外国资产阶级的坏书所致。他还痛下决心，今后要努力地读毛主席的书，争取早日按毛主席的教导重新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轰动！效果十分轰动！

但不是主任和他所预想的那种轰动。

他的发言还没结束，会场上就骚动起来，有的女孩哭叫着冲出了会场，有的家长跳起来怒骂，还有人举起拳头要打他……

他目瞪口呆。

主持人狼狈地宣布散会。

几天后，一纸“逮捕令”展示在他面前。上面“犯罪缘由”栏上写着“流氓罪”三个大字。

手铐一戴，他就来到了看守所。

听完了他的犯罪故事后，同号的犯人都很失望，说没彩头。

老犯人韩拴紧鄙夷地怒骂道：“傻×！”然后转过头去，哼起了小曲：“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裴和阳木木地僵坐了几夭，失神的眼睛一直望着小窗外的天空，半天不说一句话，也不动一动。

我发现，过了几天以后，他的脸上渐渐有了点生气。特别是街头的大喇叭声隔着高墙飘进铁窗时，他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像是重逢了久别的老友。

当时许昌县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是个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古老监所，与有名的“关云长夜读春秋”的“春秋楼”只有一墙之隔（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建起了“春秋楼公园”，看守所迁往城外，原址拆毁，成了公园的花坛）。裴和阳来到时，喇叭里整天播送的都是“评水浒、批宋江”的内容。

看得出，这些声音使他兴奋起来了。他走到门前，把头伸出小窗，向看守要笔和纸张。看守问他做什么用，他说要写检查和交待材料。拿到纸笔后，他就急不可待地伏在地上，匆匆地写起来，一会就写满了十几张纸。

听说我上过大学，他把写的东西拿给我看，说请我提点意见。

我一看，这哪是什么检查交待呀，而是一篇篇的“大批判文章”。记得第一篇的开头写道：“邓小平的杏黄旗一举，牛鬼蛇神们纷纷云集……”

我苦笑着说：“你还有心思干这个？你忘了自己如今是什么人了，也不知道这是在哪里了。再说，你写的这些，不都是抄报纸上的吗？有什么意思？”

他正色回答我：“无论到了哪里，无论我成了什么样，我都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啊！批邓这一大仗，我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无言以对。

第二天“放风”时，他把那些“大批判文章”交给了看守，并且还要求再给些纸张，说他要继续写。

看守所的王海法所长翻了翻他写的东西，黑着脸把他训了一顿：“给你纸笔是让你写检查交待的，谁让你写这些了？这些东西用得着你写吗？”

最后断然地说：“不给了，不给了！”

裴和阳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又呆若木鸡了，终日再无一言。

过了两天，是犯人家属来送生活用品的日子。韩拴紧家人给他送来了冬衣和厚厚的一叠卫生纸，不是城里人用的那种细白的卷纸，而是农村土造的粗糙黄色的“草纸”。

裴和阳的眼睛又发亮了。他凑到韩拴紧身边，讪笑着说：“老韩，这纸给我几张，好吗？”

“干嘛？”韩没有好声气地问。

“我看这纸也能写字，我还想写大批判文章，求求你。”

韩拴紧眼珠一转，阴笑一声，说：

“行啊。可没有白给你的道理。想要，拿馍来换，一个馍换一张！”他可真不愧是个“投机倒把”的老手。

看守所里开饭时，每人每顿是一碗汤，一个馍。汤是萝卜青菜汤，有几根粉丝，上面飘着几个油星；馍大都是黑色的薯干面做的，过年过节才是白面和薯干面的花卷。裴和阳如果拿馍换了纸，就只能用那碗清汤充饥了。

但是，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

从此，他一连多日，顿顿只喝菜汤，把馍省下来，找韩拴紧去换草纸。

每拿到一张，他就匆匆地趴到地上，用细密的小字在纸上写起来，写得纸上几乎没有一点空白处……

他枕边的“大批判文章”一张张积累起来，居然成了厚厚的一叠；同时，他眼见得一天天更加消瘦了，脸上黄里透青，两只眼睛显得越来越大，放射着疯狂的亮光，身上的肋骨一根根突出，走起路来不断地打晃……

直到有一天早晨，岗楼上突然架起了机枪，看守点着名叫出一批犯人，把他们五花大绑带出了大门。大家都知道，这是要开公审宣判大会了。

中午时分，门外汽车吼叫，一些犯人又被押回来了。回来的是判了徒刑，没回来的是已经执行死刑了。

幸好，裴和阳回来了。

“判了多少年？”留在号里的人急忙问道。

裴和阳面如死灰，毫无表情，轻声回答：“12年。”

第二天，他被押走了，不知送到哪个监狱或劳改场去了。

我注意到，在收拾东西的时候，他对着那叠“大批判文章”愣了半天，犹豫再三，最后还是拿了起来，装到包袱里，带走了。

从此，我再也没听到他的音讯。

◇ 故事三则

▲ 脖子的故事

进入看守所的第一项程序是要填写一张登记表。在表的右上方有个栏目：所犯罪行。我填写了“思想犯”三字，意思是想申明“思想无罪”。本以为要费一番口舌，但狱吏看了竟然没说什么。以后的几年里，年年都要像汽车年检一样填写这个表，我都这样填，他们也都默认了。大概他们根本没听说过“思想无罪”的道理，真的认为有些思想就是犯罪吧。

捅破了这层纸的是监号里的一个老犯人韩拴紧，他笑着说，啥鸡巴“思想犯”啊，不就是“反革命”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玩文字游戏。他说：“这号里刚走了一个‘反革命’，又进来了一个。”

接着，他就给我讲了刚走的那个“反革命”的故事：

那个人姓王（他说了名字，但我没记住），许昌东面扶沟县（或太康县，记不准了）的农民，是拉煤路过许昌时被抓进来的。

河南的煤矿大都集中在豫西伏牛山麓，如平顶山、禹县、密县等地，而广阔的豫中、豫东平原上很少有煤矿。那里农村的生活用煤、生产用煤都要到豫西去拉。特别是产烟区，每年为了烤烟（当地叫“炕烟”）需要大量用煤，所以，生产队和社员家都要组织架子车队，跑几百里路上山去拉煤。拉煤车主要是靠人力，用牲口的极少，来回一趟大约需要一个星期，这是最重最累的活，也是很少出远门的乡下人最隆重的远征。我在那里“插队”时就跟着跑过一趟，看到浩浩荡荡的架子车队在路上来来往往，一眼望不到头，十分壮观，有点像现在电视上非洲大草原角马群大迁徙的镜头。

这个姓王的农民就是一匹那样的“角马”。如果他只是拉煤，尽管很苦很累，也不会带来囤囤之灾；但是倒霉就倒霉在他多事了——

禹县（现在的禹州市）不仅产煤，还是著名的钧瓷之乡，那里有很多瓷窑，盛产瓷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瓷窑不仅生产一般的家用瓷器，还配合政治的需要，生产了大量的瓷制毛主席像。这在当时可是畅销的产品，除了墙上挂着的纸质画像外，能在办公室或家里的堂屋中间放上一尊瓷制的毛主席像，那可不仅是一种让人羡慕的时髦，而且是“政治正确”的庄严标志，也是消灾避祸的圣物啊！

这个农民在禹县的煤矿装了满满的一车煤以后，又在瓷器店门口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尊毛主席的胸像——话还不能这样说，不能说“买”，而应说“请”，就像侯宝林的相声所言。“请”来的主席像放在哪里呢？思量再三，他在车顶的煤堆上拍了块平地，把瓷像面朝前，稳稳地放在了中央的最高处，然后拉着车走上了回家的路。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拉车，见到石头就躲开，见到沟坎就绕过，生怕颠坏了车顶的瓷像。

可还不到天黑，在经过一个村镇时，他就被一群学生拦住了：“你看，你看，你把毛主席弄成什么样了！”他停下车回头一看，自己也吓了一跳——一路上风刮得太大，车上的煤尘飞扬起来，把毛主席像荡得灰头土脸。他急急慌慌地向学生们承认自己太大意了，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然后，把瓷像抱下来，用毛巾清理干净，这才得到了学生的原谅。

接下来怎么走呢？他犯了难：还放在车上吧，一会儿不是又要变成“黑老包”了？抱在怀里吧，可车怎么拉呀？

左想右想，也没有好办法。最后，他想出了个办法：用绳子挂在车把上，看到脏了，随时能收拾。可绳子拴在哪里呢？比划来比划去，只能拴在胸像的最细处——脖子上。于是，第二天，他就这样上路了：拉着一车煤，车把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下挂着毛主席的瓷像。

穿过许昌市的街道时，他又被拦住了。不仅拦住了，还挨了一顿臭揍。“你这个反革命，要吊死毛主席啊！”

记得听到这里时，我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直到笑出了眼泪。那是我被捕后第一次笑。

结果是，他进了看守所，和韩拴紧住进了一个监号。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后，他被带走了，韩拴紧说，可能是移交给他家乡的公安局去处理了。

▲ 眼睛的故事

上面说的那个倒霉蛋，我没见过。我只是继承了他的铺位（一个稻草窝）。下面要说的这个，我见过，还听她亲自说过自己的故事。

那是一个禹县的农村姑娘——看守所里平时没有女犯人。1975年底，突然关进来两个女犯，一个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勾结奸夫毒死亲夫的杀人犯。她在里面住的时间很短，大约只有一两个月，就拉出去枪毙了。另一个就是这个禹县姑娘。她的名字我和其他犯人都没记住，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花”，犯人们就都叫她“一枝花”。这个外号虽然有点轻佻，但她所表现出的血性和刚烈却让人不能不肃然。

她是带着一连串的哭喊和怒骂声进到监号的，“冤枉！”“我不是反革命！”“有人陷害我！”她不停地嘶喊着，夜以继日，声音时高时低，一刻不停，一直喊了一个多星期，直到嗓子哑了，喊声才渐渐消歇。开饭时，她把发给的菜汤和馍从窗口扔出来，宣布绝食，谁劝也不听。这样的反抗在看守所是少见的，各号的犯人们都屏气谛听她从最东头的监号里传出的哭喊声。

一个多月后，我意外地获得了接近女号窗口的机会。

冬天要到了，负责看守所警卫任务的县中队营房里开始准备取暖用煤。几卡车的煤被拉进大院，看守从监号里提出两个犯人，让他们把煤粉掺土加水，和成煤泥，然后用钢模打成一块块的蜂窝煤。这虽然是个重体力活，却是人人都渴望得到的机会。因为，一是可以在大院里活动活动，享受久违的阳光和新鲜空气；二是在开饭时可以得到一个额外的馍，算是劳动补助。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等好事居然会轮到我！（后来才知道，看守所的王所长旁听过对我的审讯，对我这个“思想犯”有点同情，但又不敢公开表露，就用这种方法给我一点照

顾。这人不错，1976年“四人帮”打倒后，他给我纸笔，让我写申诉材料，还偷偷把材料传给我家人，鼓励她到北京去上访，这是后话。）

煤堆就在女号的窗下，晒蜂窝煤的场地也离那里不远。我注意到，在女号的窗口不断出现那个女孩的面孔。原来只闻其声，现在才见其人。这是个很清秀的面孔，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也就是二十岁上下。当哨兵走开时，她小声问我：“大哥，你是犯了啥事呀？”

“思想犯。”我头也不抬，闷声回答。

“噢——”她沉吟片刻，说：“是被别人告了吗？”

我回答：“嗯。有几个同事检举了我。”

“那咱们的事差不多……”

利用来回走动的机会，我们断断续续地悄声交谈着。她的案情简单到让我吃惊的程度：

她在村中是个共青团支部书记，还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平时好玩好唱，无忧无虑，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个“阳光女孩”。可她万万没想到，有一天她会跌落到这个终日难见阳光的牢房里来，而事情的起因又是那么小的一件事。

有一天，她帮助邻家的大嫂抱孩子。孩子又哭又闹，怎么也劝不住。她就想了个办法：抓来一把图钉（就是那种带红红绿绿塑料顶帽的），用手指一捻，让它在桌上像陀螺一样旋转，以此转移小孩的注意力。果然，效果不错，孩子不哭了，只是专注地盯着那些彩色小图钉在不停地旋转。

她没有注意到，桌上铺着一张报纸，而报纸上印着一幅毛主席的照片。

她更没有注意到，有个图钉是在毛主席的眼睛上旋转……

她没注意到的事，有人在一旁注意到了。她玩完了就抱着孩子走了，有人把报纸和图钉捡起来当作“物证”，去报案了。

于是，几天后，她被捕了。罪名吓人：她要用图钉钉瞎毛主席的眼睛。

她问我，估计她这事会有什么结果？

我问她，平时得罪过什么人没有？她家有什么仇人没有？在村里和生产队里有没有和她争夺权力的人……

她两眼迷惑而茫然。

我告诉她，这个看守所里关押的绝大多数是许昌县的犯人，案件归许昌县公安局管。只有少数是许昌地区下辖的其他各县的，那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直接办的案子，委托羁押在这里，因为这里离地区公安局近。比如我，就是从长葛被转来的。你从禹县转到这里，肯定是当成大案，上交地区一级处理了——当然，这也可能是好事，由上一级来处理，也许比下面的政策水平高点。我只好这样来安慰她……

半个月后，蜂窝煤打完了，我就没有机会出监号活动了，也就再没见过她。只知道，半年以后，她忽然被带走了，再也没回来。不知道是判刑了，还是无罪释放了，或者是转押到她的老家禹县去了。反正从此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音讯。

她只给我留下了这个关于伟大领袖眼睛的故事。

▲ 鼻子的故事

在看守所里住久了，我已经失去了时间的概念。这一天和那一天，这个月和那个月，这一年和那一年，都是那么相似，在记忆中成了一片混沌，无法区分。但是，这个关于领袖的鼻子的故事，还有清晰准确的日期，绝对不会记错。因为那是个不平常的日子。

1976年9月18日，是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九天，也是全国举行追悼会的日子。那天下午三点半钟追悼会正式开始，首都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整齐列队，向毛主席致哀。同时，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也同时举行了追悼，可以说全国就是一个超大的灵堂。我在牢房里可以清晰地听到街头大喇叭传来的哀乐声和华国锋致悼词的声音。

当天深夜，我久久无法入睡，心里在想着毛泽东的去世可能会对我的案件和我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我刚刚被调到一个单人小牢房，不祥的阴云笼罩在我的头上。大约是19日凌晨两点多钟，我所住的监号门被“咣当”一声打开，一个人被投进来。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本应明亮光滑的大背头已经散乱不堪，在监房里长明灯的照耀下，面孔呈铁灰色。他一屁股坐在我的脚下，半天不吭一声。我看他没带被褥，应该是刚被逮捕的，就说：“先和我盖一条被子睡吧。别想了，有话明天再说。”

他和我头对脚地躺下了，脚上的汗臭气直冲我的鼻孔，令人窒息。我调过头去想睡，可他却嚤嚤地哭诉了起来。

他叫李伟森，是许昌豫剧团的舞台美工师。18日早晨上班时接受了一个紧急任务：立即替剧团制作一个大花圈，中午以前送到地委礼堂的毛主席追悼会会场。下午那里将和北京天安门广场同步举行追悼大会。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非同小可，马虎不得。他连忙行动起来，搭架子，做纸花，裱宣纸，写挽联，终于精心做成了一个直径两米多高的大花圈。这时，美工师身上的艺术细胞活跃起来了，他想制作一个与众不同的、有创意的作品。别的单位的花圈都是周围几层纸花，再插上些松柏枝，而中间都是一个巨大的“奠”字，河南农村的花圈至今都是这样的。李伟森想作个独特的设计：他把那个俗气的“奠”字去掉，换上了一幅毛主席像，让他老人家围在花丛中，他觉得这才是给敬爱的毛主席献上的花圈。

花圈做好了，单位领导审查了，没发现什么问题，就派人送进了地委礼堂。下午开会前，地委秘书长来审查会场布置，发现了这个与众不同、“不规格”的花圈。一看下款署名是豫剧团，就派人通知剧团：立即来人现场修改花圈。

李伟森匆忙赶到会场，硬着头皮聆听了地委秘书长的一顿臭骂，然后赶紧动手修改。怎么改呢？回去重新制作一个“奠”字吧，时间来不及了，离开会只有一个小时了。灵机一动，他用一张宣纸把毛主席像覆盖起来，然后，匆忙制作了一朵特大的纸花，缀在花圈的中央。地委秘书长看了，并不十分满意，但由于时间紧迫，也只得如此了——李伟森终于擦着满脸的冷汗，松了一口气。

下午，追悼会开完，他回到家里，才端起饭碗，门就被踢开了，几个警察进来，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地区公安局，立马就开始了审讯。

一开始，李伟森完全蒙了，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法。但随着审讯的进程，他才渐渐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

当他用宣纸覆盖了毛主席像，又缀上了一朵大花的时候，那朵花的铁丝穿透了宣纸下的毛主席像，正好在毛主席的鼻子上钻了个大洞！

这还得了！在举国哀痛的追悼日，你居然敢在他老人家的鼻子上钻个窟窿！何其猖狂，何其反动？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就这样，李伟森在被审讯了半夜以后，被扔进了我住的监号。

从此，他和我在一起住了一年零四个月。1978年初他获得“免于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家。到1979年，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才最终获得“平反”。

附录

2008年，在我和李伟森于铁窗下分手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又见到了他。他平反后就离开了豫剧团，先后到许昌电视台和一家报社工作，如今早已退休了。和我见面时，他送给我一件礼物：当年我预料他将要出狱，就提前给他写了《赠别》诗（当时我太乐观了，写诗后四个月他才出狱）。写着这首诗的几张纸，他居然一直保存了三十年，这让我非常感动。

赠别——送难友李伟森出狱

秋阳何明丽，寥廓楚天高。
金风一萧飒，黄叶纷纷飘。

飘飘秋桐叶，落地总归根。
郁郁笼中鸟，引颈望青云。

青云九霄上，归雁正南翔。
回首一声唳，哀音震八荒。

八荒苦空阔，日月长周旋。
临别共屈指，会君已一年。

去年秋寒夜，阶下我迎君。
今日送君去，铁窗秋又深。

与君初会日，遂为同病怜。
相怜且相助，窗下共凉炎。

凉炎知世态，沉浮识人生。
此中甘苦味，君我两心同。

同心同甘苦，莫谓萍水逢。
世间酒肉友，绝然无此情。

同心不同命，人事多苍黄。
送君奋翮去，亦喜亦忧伤。

我喜罗网开，朗朗秋月圆。
我伤君去矣，铁窗寂寞寒。

寂寞寒窗下，注目送君行。
祝君风云路，万里锦帆平。

锦帆张万里，征途何茫茫。
他年若与君相会，青梅煮酒话沧桑。

（未完待续）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 【往事非烟】

### 文革初期思想巨变记

• 吴根耀 •

文革初期指1966年6月至1968年12月，我是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三年级的学生。这一时期的文革生涯，或说我对文革的态度，可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从66年6月至67年初是积极投身文革的阶段。那时的我，深信“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神的召唤，自当洒一腔热血为“反修防修”而奋斗，故在批黑帮和揪斗走资派、声援外单位和外地的学生（群众）运动等诸方面，都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

67年2月至7月是“观望”文革的阶段。我什么派也没有参加（之前也没有加入过任何红卫兵），尽管迫于当时的形势我还得参加各种活动如游行等，但实际上是把自己置身事外，只是观望事态的发展。潜心拜读过马列原著，没有收到舆论宣传的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对复课闹革命我是全身心地积极投入的，尽管仅月余，却令我受用终生。

67年8月到12月是逍遥阶段。这时已不再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打扑克和读些杂书。坚持读书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毕业后可能搞不成专业了（即不像刚入学时想的分配到研究所了），今天学些鸡鸣狗盗之术，没准将来还能派上用场呢！

68年是第四阶段，堪称“无奈”阶段。与前阶段不同的是：逍遥阶段只感到无聊，人身安全没有受到威胁，对文革只是厌倦；这阶段则是明显地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证，因而生活在阴云下，有时感到是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压抑环境，甚至有恐怖感，对文革已是厌恶和反感。

是什么事件，令我在短短的2年半之内对文革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 炮轰康生

67年1月20日下午，我跟无线电系的张渝娜去清华参加了一个串联会，主要是生物系樊立勤讲。他介绍了党校、清华等校最近出现的反康生思潮的概况，罗列了他掌握的一些康生的材料，还说了康生私生活的一些事（如爱收集古砚的癖好）。之后，他凭这些材料先后给康生贴了2张大字报，署名仅他一人。

会后，我征求张渝娜的意见。她明确表示要反康，说：文革这样搞不行，把开国功臣、老干部都打到了，中国怎么办？确实，这半年多里看到的听到的，大学校长都是黑帮，省委书记都是走资派。张渝娜说的有道理。

我小时候是个《水浒》迷，读过很多遍，当然受其“当今圣上至圣至明、蔡京高俅之流陷害忠良”观点的影响。至于把奸臣对号到康生头上来，则与之前见到他2次都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有关。

第一次是66年6月5（或6）日，我在校医院附近看大字报，听到有人喊：康老来看大字报了！我似信非信（他真要看大字报只能夜深人静时来），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走去，看到一个瘦削的老人，双颊塌陷，脸色泛黄，一口焦黄的牙齿。他讲话有明显的山东口音，显得很激动，讲了几句就喊起口号来了。这个人与我以前见过的大官（如史梦兰）的模样、举止、说话腔调等都大不一样；尤其令我不解的是：大首长应该很有城府且表现沉稳的，这种场合何必如此亢奋还要高呼口号呢？

第二次见到他是那两晚上东操场的万人辩论会。他抽烟时把空烟盒丢在主席台上，被担任保卫的同学捡到了。我们才知道康生抽的是熊猫烟，据说60元钱（1个老工人的月薪）一包。另外，康生的一句话很刺耳，我们听了不服气。他说：“我告诉大家，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一个也没派？那北大和其它大学的工作组哪儿来的？只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派的么！再说了，我们都当过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下乡之前，工作队领导反复强调：一定要跟农民群众讲，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四清）工作队！

于是，我也同意反康。那个串联会后，我在张渝娜的宿舍里编了一期“动态报”，介绍了社会上的反康思潮的情况；也加了几条别的内容以障耳目。张渝娜连夜刻蜡板、印刷并分发到附近宿舍。

那时我们想得很天真：先轰一炮看看，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轰垮了活该；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越轰越坚强！但事情的发展却远不是这么简单。陈伯达和江青几乎是气急败坏地立即站出来表态：康生同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不能炮轰！我们一下傻了，从头凉到脚，知道犯了大错。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或时刻，甚至生与死也可能只是一步之隔，何况是左派与右派之间？57年反右不是“阳谋”吗？文革当然更是一场大“阳谋”了。紧急刹车吧，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嘎然而止，我的文革生涯进入了第二阶段。

#### ◇ 智者的点拨

67年8月回上海，拜访了一位长辈，是历史老师。一进门他就问：“你在北大是哪一派？”我答哪派都没参加。他说：“好，以后什么活动也别参加”。他又问：“还记得这十几年里挂了哪些领袖像吗？”我答后，他说：“这几年，每逢五一和国庆，报纸上头版头条都是毛、刘二位的大幅照片。尽管照片下面有文字说明，但老百姓们不一定弄得清楚什么是党主席什么是国家主席，只知道中国有两个主席。老话说‘天不可有二日，民不可有二主’，现在天有二日了啊！”



“天无二日”，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这样论述文革。像是在幽深黑暗的隧道尽头看到了一丝来自出口的亮光，尽管距离出口还是那样遥远。当然，我听了他的话，回京后什么政治活动都不参加了。

这次找他主要是为了借书。他从书柜底层的最深处找出来2本书，一本是慈禧太后的传记（上、下两册），另一本是许啸天著的《清宫十三朝演义》。重点是阅读后者，最感震惊的是太平天国由盛而急剧衰败的转折即天京内讧。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借“天父”之名要天王封自己为万岁。天王密诏北王韦昌辉返回天京诛杀东王。杀掉东王和3万余东府将士后，北王持诏滥杀无辜，甚至血洗翼王石达开府，导致民怨沸腾。天王乘机诏告天下“北王伪作天王密诏”，逼迫北王自尽；接着处斩了随北王进京的燕王秦日纲。翼王心寒，被迫离京出走，随其西行者达20万之众。

当时只是把天京内讧作为历史故事来读的，绝无一丝一毫“以古鉴今”的联想。4年后即1971年的9月下旬，我出差到咸宁地区。晚饭后出去散步，恰逢军分区的会议散会，军人列队退场。只见他们个个耷拉着脑袋，铁青着脸，垂头丧气，像丢了魂似的，完全不同于昨天那种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的模样。我一下呆了：莫非有什么惊天巨变？马上去把近期所有报纸都翻阅了一遍，发现9月10日以后“黄吴叶李邱”突然绝迹，“二月逆流”的老臣重返政治舞台。夜深人静，我偷偷地嘘出一口冷气，惊曰：林彪——当代北王？

#### ◇ 刘玮之死

刘玮是天津人，构造地质专业的学生。65年元旦，四年级与我们二年级的构造专业的学生一起开过联欢会，所以我认识此人。68年春节后，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刘玮被新北大公社的几个积极参与武斗的人打死了！据说刘玮回家探亲时，留意到天津挖出的一个CC特务集团中好像有张炳光。为查实此事，他之后又专程去天津，证实张炳光加入了CC，在入CC时宣誓再次加入三青团。公社的人抓他去，大概就是要他交出有关材料。至于刘玮是在哪里被绑走的，关在哪里，又是被谁审讯被谁殴打致死的，就都不清楚了。

尽管刘玮被打死的细节并不清楚，但他遭暗算的原因却再清楚不过了。他是系里为数不多的“红旗飘”之一，是个铁杆反聂派。他调查的张炳光是地质地理系的“第一左派”，新北大公社五团的精神领袖。刘揭发了张炳光的历史问题后，“保张”阵营内可能出现了两种极端倾向：有以大义为重者，认为张真有问题应话应由我们自己调查，并与张划清界线；另部分在运动初期吹捧张炳光不够卖力的人则认为机会来了，急于立功请赏“分一杯羹”，于是大打出手。可怜刘玮尚未为国出力就惨遭横祸，魂断燕园！

这使我们有了危机感。试想：连一个已分配离校的人都可以捉起来打死，我们这些人还在校内，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岂不是更容易被他们盯上？

#### ◇ 北大武斗

北大的两派武斗，从小打小闹升级为全面武斗的日子是68年3月29日。“329”其实不是武斗，是偷袭。凌晨，新北大公社的武斗队乘夜深人静袭击了31楼（化学系男生宿舍），先占领一层，再冲到四层把人逐层往下赶；被驱赶者到不了一层，只能从二层跳窗逃生。天一亮，学生宿舍区便跟开了锅似的，人声鼎沸。不要说北大惊震了，连全北京都惊震了。“329”事件宣布北大进入全面武斗阶段。除了两派都把高音喇叭架到楼顶上日夜嚷嚷外，公社还在楼顶上架起了大弹弓（“子弹”是小半块砖头），明显形成了空中优势。

一看这架势，北京的及近途（如河北）的同学都躲回家去了。我们这些离家远的，感到还没有到“最后关头”必须离校，但又不愿也不敢在学校呆着。商量的结果，是每人去买一张4月份的学生月票，白天在外头玩（实际上是“混”），晚上回校去睡觉。颐和园、北海等地已去过多次，故主要跑一些边远的地方，路上也能多耗点时间。

我们不在校的日子里宿舍楼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的学生宿舍楼已经分别被两派占领，并按防卫的要求进行了必要的“改造”。37楼（以地质地理系男生为主）的北侧面临校园，怕有“流弹”破窗而入，故用桌子或床铺封死；再在墙上凿洞以解决采光和观察问题。武斗期间随时可能停电，得准备照明的蜡烛。这样，学生宿舍成了昏暗凌乱的“花”烛“洞”房。

4月26日早晨，感到校园的情况有点异样，决定先在37楼呆会儿。上午，有女生（可能还有男生陪同）来36楼（女生宿舍楼，已被井冈山占领）取被褥等物品，因一层的门窗都已封死，东西只能捆好后从二楼吊下来。快中午时，头戴柳条帽、身穿紧身棉袄、手持长矛的公社武斗队员在36楼前（南侧）集结，开始攻楼。先攻一层，未奏效，然后架梯子试图从二层的窗口攻进去（几个窗口同时攻）。守楼的井冈山人则拼死反抗，连暖气片都搁到窗台上了（未丢下来，不然真要出人命）。

目睹这貌似悲壮的场面，我惊呼真是历史的大倒退！800年前十字军东征的情景竟然在今天的北大出现了，只是背上的十字架成了口袋中的小红书！第二个想法则是呼天天不应的满腔悲愤：敬爱的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啊，两年前你们不是常来北大指导文革的吗？现在打成这样了，你们却连气都不吭一声，都到哪儿去了呢？

当时37楼里总共约20多人，都是反对武斗的，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大家都聚集到四楼，紧张地关注着眼前的这场武斗，庆幸公社没有来攻不具任何抵御能力的37楼。不然，我们就得全都成为“战俘”，难免要惊吓一场、还受点皮肉之苦了。

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只能回家以避战乱了。乘天黑以前先把认为将来可能有用的书籍词典等分批搬运到楼顶上，在靠近通风道的地方藏好，压上砖头和木板。天黑后，先穿毛衣，再把所有的单衣裤都穿在身上，最后把那个人造革的大旅行袋绑在背后（万一有长矛刺来多少能起点保护作用）。当时37楼前的围墙已扒开一个口子，砌墙的石块还未运走。

“逃难”的人踩着石块，鱼贯而出，跑过马路就迅速分散了。我连奔带跑地穿过海淀，在黄庄上的公共汽车，直到了新街口靳中华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 ◇ 避难与遭难

为避北大武斗的“战乱”，68年4月底起在上海家里住了4个多月。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斗批改”搞得轰轰烈烈，到处都在深挖暗藏的阶级敌人，于是，不少家庭就“出事”了。我家尽管地处偏僻（在浦东），一度也成了北大同学的“避难所”。

第一个来避难的是邬金华，武汉人，其准岳父是上海海运学院的老师。他曾是国民党海军一艘炮舰的中尉二副，后投诚解放军，再转业到地方上任教。一“清队”，这不明摆着有个国民党反动军官么！白天总有造反派去要他交代问题，邬就不好在准岳父家里呆下去了。

第二个来避难的是杨颂孚，其父是上海天文台地磁组组长。杨的哥哥是北航的学生，还是先当的兵后上的学，说明家庭背景无大问题。那天杨突然来找我，显得心神不定。他早晨

出去散步，回家路上被母亲拦住，说家里有天文台的人在“找东西”，给了他点钱要他快走。他就只能先来我家暂避。

我对他们两人说：只管放心住在这儿，我家没人来抄，就是生活苦一点。好在家里已把厨房（上海叫的“灶披间”）内原堆稻草和杂物的那块地方隔成了一个小房间，晚上3人挤在一张大床上睡。约一周吧，杨颂孚就跟着邬金华先去武汉了。

这两位刚走，我家也遭难了。其实父亲只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穷工人，怎么“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挖到他头上了呢？因为造反派头头的“逻辑”是：你在旧社会生活那么多年，不参加国民党，怎么可能呢！要不你怎么过来的？于是，就要他交代参加国民党的问题。

既然属“清队”对象，当然有惩戒措施。一是调离原码头去上“荡班”。“荡”即“晃荡”，哪里缺人到哪里去顶班，随叫随走，没人替你不得下班。二是隔三岔五就找几个造反派来给你开个会，先拍桌子喊口号吓唬你一顿，再搞“攻心战”，弄张什么纸来一念，说你当年的某某同事已承认参加过国民党，诈得你心惊肉跳、神魂不宁。

这样拖了50多天，实在找不到什么证据，就通知父亲回原码头正常上班。既没有什么审查结论，也没有任何道歉的话（倒是父亲对造反派千谢万谢），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两件事使我对文革的态度转为反感。我发自内心地认为是毛主席送我上了大学，我们家也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带来了安定的生活，怎么还要受冲击！从来政治运动都只抓一小撮，所谓百分之一二三，现在弄得家家遭难，人人自危，这是搞的什么运动？！

#### ◇ 悲愤离校

武斗结束后，只能返校了，因为要领这几个月的助学金和粮票。回北大也只是“身回”，什么也不想干，只求早日毕业走人。国庆节上午，像文革前一样参加了游行，发现所有的彩车都装着一个浅绿色的长玩意儿。初看样子像冬瓜，但端部变尖且弯曲，有点像桃子的顶端，不过其形状和颜色显然不是桃子。到底是什么东西要这样被当成图腾来崇拜？有人很好奇，我却什么也不想问，因为相信弄个什么新玩意儿出来，无非又是愚民整群众的另一招。

工宣队领导的日子，就是一天的三段时间都学毛选：通读1—4卷。重要的文章只有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因文内传达了最新的最高指示而必须连夜敲锣打鼓地庆祝。不过我们对这篇文章实在不敢恭维。文革初期踢走工作组时号召“群众自己领导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现在的工宣队其实还是工作组，姚却在那里气势汹汹地责问：难道工人阶级不是自己？难道工人群众不是群众？简直是太不讲理了。

真要说队员素质，工宣队比当年的工作组至少低两个数量级。后者都是大学教职员或机关干部，堪称吾辈师长。绝大部分工宣队员是胸无文墨之人，一张嘴，不是骂粗口，就是读白字。指导员是军官，四川人，全系大会上每次提到林超（著名地理学家），总是说“龟儿子格林超”，或“林超格龟儿子”。我班的一个工宣队员（留八字胡），每次开会必开口训人，颠来倒去只两句话：我们为什么要来？就是要防止你们走到崖（邪？）路上去！对已经走上崖路的，要把你们从崖路上拉回来！我们只能咬紧牙关绷着脸，免得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57年反右，“反”出了个“外行领导内行是绝对真理”；而今，文革2年多一点，大老粗们就来教读书人识字明理了。

总算要离校了。这时，分到哪里、“面向”什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尽早离开这是非之地。真到离京这一天，心情反而更加沉重。我们拜别的只是文革的北大，并没有告别中国的文革。在校，我们还是一个群体；一别燕园，我们就只能孤身直面地方上和基层单位的文革了。尤其令人寒心的是：离京前夕刚传来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最新最高指示；播音员似乎还特别拖长了嗓门念“大学毕业”这几个字。这岂止宣判了我们求学之路的死刑，还把我们降格为“知青”了。我们还有出头之日吗？我们当年的雄心壮志和美好愿望，难道就与这一腔悲愤永远地埋在未名湖畔了吗？

（2017年5月22日定稿于北京）

〔作者简介：吴根耀，男，籍贯上海市，1946年11月生。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68年12月至1978年9月在湖北挖煤。1978年10月起师从著名大地构造学家张文佑先生，于1981年和1985年先后获理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留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

□ 来源：《风雨未名湖——北大老五届往事》，张从、奚学瑶、郑振卿主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2月

~~~~~

【亲历者言】

毛泽东在林彪出走的那些日子里

• 陈长江 •

◇ 九一三前后我为毛主席站岗

1950年我调到毛主席身边做警卫工作，从副中队长、中队长到副大队长……整整27年，尤其最后10年，我没有离开毛主席一步。我的具体工作是：带好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中队，在毛主席住地值班，随毛主席巡视。我遇到许多困难，不时有某种委屈或种种意想不到的危险，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九一三”事件。

◇ “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九一三”事件前，一向自信的毛主席陷入从未有过的苦闷之中。也许是发现什么征兆，或是有什么预感，他很少笑容，也不再逗趣，吃不下，睡不着。

有一天破晓，毛主席出来散步，我像往常一样急忙跟上。毛主席问我，门口哨兵带枪弹了没有？以往毛主席一向不喜欢荷枪实弹，所以我们布哨很少，而且大都便装。我说不仅带了手枪，还带了冲锋枪和机关枪，子弹也很多，一二百敌人都不在话下。毛主席满意地点头，说有坏人，要提高警惕……

1971年8月，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和中办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要我迅速布置毛主席南巡的随行警卫。他们强调去年庐山会议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情况更

加复杂，有些地方还在武斗，铁路沿线的治安也不好，要随时准备战斗，并交代这次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处置原则、注意事项等。

张耀祠说：你们不是第一次外出，但这一次确有许多新情况，可能遇到许多麻烦、困难和危险，很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一点也不能大意……两位主任把这次外出的随卫任务讲得如此严重，我并不太吃惊，我对1970年的庐山会议还是有所闻的。

有一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院里散步，对我说，军队闹得厉害，有的不听指挥，要进行改组。我说主席，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战士，没有一个不听你指挥的。毛主席说，你不了解情况，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这次准备外出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做得十分仔细，号召干部战士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 南下武汉忽然点唱国际歌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南下武汉。

毛主席一向不摆架子，不讲排场，外出从不要人送行，包括中央领导人在内。这次也不例外，他一上车，专列就启动了。沿京广线南下，第一个停车点是石家庄，检修加水，15分钟后继续走。第二个停车点是郑州，也只停了15分钟，8月16日下午到达武汉。毛主席换乘汽车，沿着武汉大街，经蛇山、龟山，过长江大桥，住进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楼。

当晚，毛主席召集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开会。这次外出只有汪东兴跟随，工作人员也比以往少得多，所以毛主席有什么重要事情，都让我们办。第二天，毛主席开了两次会，25日、27日又开了两次会，在此期间他还找刘建勋、王新、刘丰，后来还有华国锋等人谈话。我负责迎送客人，不参加会议。汪东兴召集我们随行分队开会，传达毛主席的谈话内容，要我们领会精神实质，并强调提高警惕，做好警卫工作，随时准备打仗。

8月27日14时，毛主席乘专列南下。这次与往常不同，随毛主席南下的还有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等人。毛主席坐在会客室正中的沙发上，刘丰等坐在两侧的长沙发上。

服务员倒完水准备退下，毛主席突然叫她唱《国际歌》。服务员一边唱，毛主席一边用手在茶几上敲出节奏，嘴唇也一张一合，在场的人也都和着歌声。

唱完《国际歌》第一段，毛主席还在打着拍子，服务员又唱了第二段，和者更多了，成了大合唱。接下来大家唱一段，毛主席讲一段，讲得最多的是“为真理而斗争”，“要团结”。毛主席说《国际歌》和列宁的文章《欧仁·鲍狄埃》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观点和立场，那里面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毛主席还说在庐山会议上他写了一个700字材料，提出奴隶创造世界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接着，主席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条条要记清，现在有几条记不清了；还说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

到了长沙，刘丰等与我们分手了。毛主席没讲为什么把他们从武汉带到长沙，至今我也没有确实答案。

◇ 质问丁盛、刘兴元

8月28日傍晚到了长沙，毛主席住进长沙市蓉园一号楼，这是他故乡的省会，又是他青年时代闹革命的地方，他极爱这里。但这次来，毛主席不像以前一样到处走一走，而是忙着召集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开会、谈话。

有一天，穿着毛巾布睡袍的毛主席找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政委刘兴元谈话，我们不解的是还让湖南省省委书记华国锋参加。这个小型会议在毛主席住的一号楼开，我把与会者迎进去，便在门口值班。

这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不论是卫士还是秘书，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警卫部队的成员。担任主席卫士的是一中队副中队长商来保，秘书是原一中队副区队长高碧岑，保健方面则由后来任305医院副院长的吴旭君等负责。那时，张玉凤刚来不久，主要是做些勤杂事情。虽说有这么个分工，但我们经常是一人身兼几职。

毛主席与丁盛等人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我上前把门打开，一股凉风吹出来。屋里装了空调，23度左右，而外面已经30多度了。我感觉到他们谈话没有什么困难，丁盛、刘兴元情绪很好，很有信心的样子。毛主席与他们一一握手，他们穿着军装连忙敬礼。

毛主席叮嘱说：国锋同志这就穿起军装，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把军区的事情管起来。毛主席又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有事要找他商量。丁盛、刘兴元说请主席放心，华国锋也表示一定把广州的工作抓起来。华国锋和汪东兴送丁盛和刘兴元先走，又返回室内。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华国锋才离去。

大概是第二天，汪东兴向我们传达：毛主席当着许多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丁盛、刘兴元：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那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把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有什么好处？

传达时汪东兴没有点名，我们也不好细问，但真有些担心啊，不知道哪里、谁人又出大问题了。

毛主席在长沙住了4天，不断找人开会、谈话，非常忙碌。根据毛主席谈话的情况和工作安排，我们警卫干部几次研究，总的印象是情况严峻，要随时提高警惕，加强责任心。无论是值班员还是哨兵，都要做好应急准备，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能拉得出，顶得住，确保毛主席的安全。

◇ 南昌会许世友

8月31日，毛主席专列离开长沙，调头向东，到了江西南昌。毛主席住在距市区十余里的山坡别墅，这里十分安静。记得他1962年巡视南方时曾在这里住过。

在南昌，还是分别找江西、福建、江苏等省的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毛主席点出“林彪当然要负一点责任”，“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话。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教育过来，有的可能教育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不可能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当嘛”。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来了，他穿着白汗衫军装裤，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双用麻绳、布条编织的凉鞋，鞋面还盛开着一朵“红花”，形成他独一无二的装扮。

毛主席和许世友谈了许久，最后把许世友送出门，问他现在还打猎不打了。许世友说打，毛主席哈哈大笑，与他握手。果然第二天，我看见许世友扛着猎枪，到机场附近的草滩打兔子去了。

毛主席的女儿李讷正在中央办公厅江西五七干校劳动，距离南昌只有一小时车程。李讷大学毕业后，化名肖力，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她经常出面处理问题，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之后成了《解放军报》副总编，不久又成了北京市委副书记。毛主席很生气，一定要李讷下去劳动锻炼。毛主席到南昌时李讷已经劳动一段时间了，我们以为主席很宠爱这个小女儿，又很关心她锻炼得怎么样，一定会叫她来谈一谈。但主席直到离开南昌，也没有见李讷一面。

◇ 9月初在杭州的不安

9月3日专列到达杭州。专列刚停稳，毛主席就找浙江省负责人熊应堂、南萍、陈励耘等谈话。与他们谈了九届二中全会，又一起唱《国际歌》，还讲了“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谈话后毛主席才住进夕阳山下、西湖边上的刘庄一号楼。毛主席每次来杭州，都爱住在这里，在这里召开过很多重要会议。我还是老习惯，由近及远地查看周围环境。

一号楼实际上是四合院平房，院子很大，古柏参天。翻过一座不大的山，就是雷峰塔。地形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服务人员却多了生面孔，无论男女都训练有素。我一问，才知道是为这次任务特意挑选的。外围警卫也有变化，浙江省公安机关的老熟人都靠边了，由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负责。出面接待毛主席的几位负责人中，只有他说话算数，掌握着省军区和治安大权。

我注意到，毛主席不知道发现了什么，这次在杭州越住情绪越不安。见毛主席这样，连我们也寝食不安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

一天傍晚，我正在礼堂前的大榕树下给部队讲形势和注意事项。干部战士身着便装，坐在小马扎上，四五十人整整齐齐。毛主席由小商、小吴陪着散步，来到队前，大家热烈鼓掌。

我上前报告：主席，我们正在学习，讲你说的那个“三要三不要”。我讲得不好，请主席给大家讲一讲吧。毛主席摆摆手，说长江，你指挥大家唱《国际歌》。我从来没有指挥过，正为难，不知什么时候赶来的汪东兴说，毛主席说了，你是队长，不指挥还行？！

我硬着头皮指挥大家唱了两遍《国际歌》。毛主席很高兴，说唱得不错，再唱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了，我问毛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他挥挥手，说你们的歌唱得很响，不仅要会唱，还要照着去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嘛。

这次南巡，毛主席活动的范围比较广，接触的人也相当多，其中不少是林彪一伙的。也就是这几天，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干部开会，说前几天给你们讲“三要三不要”那是有所指

的。有人要分裂党，有人不听指挥，现在情况比较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搞破坏。我很想知道指的是谁，好心中有数，以利防范。然而长期警卫养成的习惯，深知此时不宜提出任何问题，重要的是做好应变准备。不过，显而易见这次来杭州，确与往日有很大不同。

以前毛主席来杭州，对浙江省委、省公安厅的同志不仅很尊重，很爱护，也很有好感。如今不知为什么，毛主席对掌管杭州警备大权的陈励耘非常厌恶。有一次陈励耘来，毛主席毫不客气地问他：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上找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广州的顾同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陈励耘支支吾吾，狼狈不堪。

尤其越到后来，毛主席了解到的可疑情况越多，越觉得问题严重，对陈励耘他们也就更加不信任了。9月8日午夜，我们刚吃过夜餐，毛主席突然叫小商立即通知专列连夜转移到百里外的嘉兴。当时我猜测，我们三个专列停在一个叉道上，目标过大，有人认出毛主席的专列了。但到底为什么连夜远调专列，毛主席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

◇ 忽往上海见王洪文

9月10日这天与往日一样，我们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特别安排。上午我们与驻地警卫营打篮球，非常激烈。这么热的天，上场的球员个个像水洗过一样，球赛结束后连忙洗澡洗衣服。

中午刚过，毛主席忽然调专列，没说往哪里走，只说不要告诉陈励耘他们。湿衣服还在“下雨”，战士请示怎么办，我说用雨衣把湿衣服包起来带走。

考虑到复杂的情况和我们并不明了真正的敌人是谁、在哪里，为应付可能的意外，我安排前卫车和后卫车分队人员提前进入车站，前卫车要提前几分钟走，后卫车要控制车站进出口和登车地点，只留下30多人随主席行动。我和张耀祠乘小车在前面开路，毛主席由汪东兴陪着坐小车在中间，警卫部队乘一辆面包车殿后。从出发到登车都很顺利。15时专列离开杭州车站，开往上海方向。

事后我从汪东兴回忆中得知，在刘庄的工作人员中，有人秘告毛主席，陈励耘布置要他注意主席的活动情况。另一位与主席交往很深的领导干部托人捎信，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停在笕桥机场支线上的毛主席专列“碍事”。这些异常情况引起主席的警觉，当机立断，下令离开杭州。18时许，专列顺利抵达上海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专运站。

20多年来毛主席每次到上海，都下去住几天，因此我们也按惯例作了下车的准备。但是主席这次却没有下车，而是把上海市的党政军负责人王洪文、马天水等找来，在专列上开会或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下车走了，我们在火车上吃晚饭，并安排过夜。

当晚21、22时，汪东兴找我们几个，包括秘书、卫士。他拿着小本子，一页一页地翻，有选择地传达毛主席刚才的谈话内容：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军队会造反？

汪东兴讲到这里，欲言又止，很快翻到下一页。直到1972年3月，我读到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才明白，原来汪东兴翻过去的那段是“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汪东

兴要求我们严密部署专列周围的警戒，重点部位加设双哨，干部要加强值班。我们一下加了五六个哨，还增设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巡逻哨，并让哨兵佩带了冲锋枪。

9月11日上午，许世友来了，我把他引到毛主席车厢门口，汪东兴接他进去，谈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中午才结束。毛主席没留他吃饭，说你自己吃些吧。我把许世友送下车，听许世友说：请主席放心，南京军区指战员听党中央的指挥，我们已做好了安排，有了准备。

我们的专列从上海开出，向南京行驶。18时许到南京下关车站，我看见许世友在车站迎候。我和主席说，许司令员在下面，他说要上来看一看你。毛主席说：上午见过了，也都谈了，不见了，请他回去休息吧。我下车告诉许世友，但他仍没有走。15分钟加水后，专列启动，只见许司令员还在那里挥手告别。

◇ 9月12日点林彪的名

专列驶过长江大桥，向北疾驶。以前通常要在蚌埠、徐州等车站停车，可这次一路不停，12日凌晨到达济南火车站。毛主席原打算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高秘书已经提前通知。车一停我们下去迎接，却只迎到一位副司令员。他说杨司令员到泰州检查工作去了，要五六个小时才能赶回来。

我上车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副司令员就不见了，不久到北京开会再见，请他们回去吧。这时往北京打电话的张耀祠等人也上车了，毛主席交代立即发车。继续向北，跨过黄河，直奔天津，停了15分钟加水，然后继续快走。这时毛主席传话，在丰台车站停车。丰台车站距离北京站不足20分钟，主席从来没在这里停过，这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13时10分，车停稳了，车门打开，正好看见丰台站的站牌。我把等候在站台值班室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纪登奎，北京市委书记兼卫戍区政委吴德、司令员吴忠引上专列，然后退出。他们谈话两个多小时，汪东兴陪同。

后来陆续看到这几位领导人写的文章，才知道毛主席首先了解北京的情况，同时点了林彪的名，然后谈了防止武装政变的必要部署。毛主席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要李德生在南口布置一个师，防范可能的更大规模的极端行动。

我送走他们时已经很晚了，我们才上车吃午饭。我以为吃了这顿饭就该走了，谁知到17时还没有动身的消息，又在专列上吃了晚饭。饭后还不说出发，直到19时多了，夜幕将降临，才接到向北京站开进的命令。驶入北京站，像往常一样，没有人迎接，只有警卫局的大车小车，接人运东西。我们很快换车上路，顺利回到中南海。

外出一个多月了，每天提心吊胆，特别是10日以后，好几天没睡觉，如今平安回到北京，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顿时注入全身。跟随毛主席外出的汪东兴、张耀祠也都回家了，我把哨兵和值班人员安排好，交代了注意事项，走时已经是22时多了，部队已经熄灯。我几天没睡，到家一碰枕头就睡着了。

◇ 林彪出逃的当日

刚睡不久，游泳池中队值班室派人叫我马上回去。刚睡下就被叫起来，我很不高兴，但知道肯定有大事，立即骑自行车进中南海西门，到了游泳池值班室。汪东兴、张耀祠已经到

了，他们面孔绷得很紧。他们每天晚上陪毛主席，白天还要管理部队，生活不规律，睡觉很困难，安眠药的量很大，不睡到一定时候被叫起来，那是很不好受的。看到他们，想到我刚才那阵子不高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汪东兴对我说，林彪逃跑了，是乘飞机跑的。我大吃一惊，副统帅、国防部长、除毛主席之外的最高领导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所有机密。我急躁地问：他怎么逃？逃到哪里去了？恨不得立即把他追回来。

汪东兴说：他乘飞机逃跑了，别人也不好拦呀，也拦不住呀。逃到哪里去了还得等一等才能知道。我真想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可是见到汪东兴紧张的样子，也不好再问下去。

不过很快我就知道，在我到达值班室前，北戴河执行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宏电话报告，林彪女儿林豆豆要求大队长姜作寿采取措施，阻止林彪上飞机，并保护她的安全。

张耀祠马上报告汪东兴，不到10分钟，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周恩来也知道了。同时张耀祠指挥警卫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北戴河的张宏不断把新情况报过来，汪东兴报给周恩来。周恩来把空军、总参等渠道来的情况综合起来，告诉正在游泳池值班室的汪东兴，请他报告毛主席。

林彪乘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向西北方向，沿途雷达开机跟踪。当时我想，从林彪逃跑方向判断，肯定逃往苏联。那几年，苏联在我国边界不断增兵，尤其两年前爆发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非常紧张。现在林彪逃去，使我国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若搞个突然袭击，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即通知中队起床待命，并把常用的几辆大小汽车也调来，从最坏处着想，一声令下，即可启动。

刚刚睡下的毛主席也被叫起来。9月13日1时许，周恩来从人民大会堂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我到门口迎接，总理与前来迎接的汪东兴简单低语几句，然后一起进毛主席卧室。大约过了20多分钟，周恩来、汪东兴出来说，主席说了，林彪逃跑，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汪东兴请示：主席怎么办？他的安全问题……周恩来略一思索，说先转移到人民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我们把周恩来送出门，他匆匆乘车回人民大会堂去了，尽管这里距西花厅只有几百米，周恩来也没有回家。

毛主席从卧室出来，我看他的脸色很不好看，显得筋疲力尽，又很生气。我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从未见过毛主席这种脸色，但他什么话也没说。毛主席还是乘坐他那辆吉斯牌轿车，出中南海西门向人民大会堂驶去。

北京的街头，安静极了。到了人民大会堂，毛主席又住进老地方118厅。周恩来不时过来与毛主席交谈，报告最新情况。凌晨2时，林彪坐的三叉戟飞出国界，便从雷达上消失了。我们经历了一段极为担心的时间，不知道三叉戟飞到哪里去了。

上午，李讷托人给毛主席带来结婚报告，要求主席批准。李讷32岁，大家对她的婚事都很关心，也有人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没有成功。她与机关的小李都是待嫁的同龄人，有时开玩笑说咱们什么时候上街捡一个去。

毛主席坐在118厅的长沙发上，从信封里抽出16开的红格信纸，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明白。毛主席问带信人，男方是什么样的人，哪个单位的，俩人关系怎么样。带信人是我们一中队的干部，毛主席很熟，他简要介绍了男方的年龄、籍贯等情况，说男方是一位服务员，没上过大学，但爱学习，爱劳动，两个人感情基础不错，都愿意结婚。

毛主席当即在报告上用铅笔批：同意，毛泽东，9月13日。让来人把报告带走。随后毛主席又陷入极度的焦虑和苦恼中。

9月14日下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发回消息，在蒙古东部的温都尔汗附近，一架三叉戟民航客机坠毁，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周恩来面有喜色，来到118厅，说终于有了结果。周恩来出来对我们说，毛主席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 自此毛主席的身体垮了

但是“九一三”事件对于毛主席来说，无疑是个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他的内心充满难以言状的痛苦，他的追求和自信都受到了严重损害。从此毛主席的身体每况愈下。头几天，毛主席没有合眼，除说天要下雨几句外，再也没有说过话。

一连几个月，他精神都不好，脸色苍黄，吃饭睡觉都不正常，也不像以前主动和警卫战士说话，甚至不想见任何人。我真的担心啊，毛主席他能承受得了吗？

1972年1月初，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平时都是主席的老秘书徐业夫通知，但那天他休息，张玉凤代理。我立即通知汪东兴和张耀祠，并报告了周恩来办公室，同时调来主席外出的大小车辆，并要求随行警卫带好长短枪和足够的弹药。

小张扶毛主席出来，我看毛主席穿得很少，李指导员拿一件棉大衣，毛主席摆摆手。这么冷的天，从八宝山回来毛主席就病倒了。加上之后几天毛主席还连着外出，到钓鱼台，到人民大会堂118厅，或开会，或谈话。80岁的毛主席再也撑不住了，1月13日突然休克。时隔不久，毛主席再一次休克。

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组成的主席医疗领导小组，后来增加邓小平、华国锋，并在原来医护人员的基础上增加几位医护人员，昼夜值班和护理。这以后，毛主席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过来。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与世长辞。

□ 来源：微信号《罕见老照片》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